

歷史教材教法舉要

趙恒烈 著



山東教育出版社

历史教材教法举要

赵恒烈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济南

历史教材教法举要

赵恒烈 著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岛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24千字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0

书号7275·93 定价 0.87 元

题 记

本书大多是我给北京市历史教师讲历史教材教法时用过
的文稿，有些内容还给辽宁、广西、河北、天津等省市的中
学历史教师和师范院校历史系的同学讲过。断断续续地讲和
写，历时达二十多年。

全书内容大致可分为四部分：（一）历史教育总论；（二）
对编写历史教科书中的一些问题的探索；（三）从教材的角度
谈历史教学中的问题；（四）从方法论的角度谈历史教学中的
问题。

有的文稿在有关刊物上发表过，此次汇集成册，或多或
少做了一些修改和增补；有的文稿是新写成的。每篇末尾注
明了发表或写作的时间。我每年到北京的中学里听一些历史
课，还收到全国各地历史教师的许多来信，他们提供的新经
验和好意见，有些已吸收进我的文稿中。本书凝结着集体的
智慧，我不过做了一点整理工作而已。

教材教法可从两方面来研究，一为比较研究法，即横的
方法。如比较不同教材的优劣，比较不同教法的效果，比较
不同教师的教学质量，比较不同学生的学习方法等等。二为
历史的研究法，即纵的方法。教材和教法有一个演变过程，
综观成败得失，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资目前教学工作的
借鉴。历史教学问题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很少过问前人的

研究成果，或许是造成这门学科老是停留在不成熟的胚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做一点纵的探索，能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取得更大的进展。本书的某些文稿，对这个研究法做了一点尝试。当然，传统的教学方法也有缺点，它忽视了发展学生的智力和培养学生的能力。大家都知道，古今中外的历史数千年，史料浩如烟海，光靠教师传授历史知识是不够的，即使有很多时间传授，学生也很难都记住。因此，我们必须改进教学方法，既要重视把传统教学中好的东西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又要敢于探索加强双基、发展智力和培养能力的新路子。教师要教会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猎取新知，发现真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历史教材教法的研究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我愿将自己的文稿化作一撮铺路的泥土，并愿有更多的朋友沿着这条修远的道路前进，共同来探求它的规律。

过去每次文稿发表后，不断得到读者来信，指其谬误，赐以厚教，获益匪浅。今搜罗成集，更望读者继续赐教，或著论箴驳，或通函海责，俾得知其失而改之。

赵恒烈

一九八二年五月

目 录

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	(1)
为什么要学习中国历史·····	(15)
要全面加强中国历史教育,要重点突出爱国主义教 育·····	(22)
继承我国古代历史教育中的优良传统·····	(27)
史料的搜集、鉴别和运用·····	(45)
略论历史知识的要素、体系和特点·····	(56)
中国历史教材编写中的几个问题·····	(64)
组织历史教材的方法·····	(84)
历史教材中写人物的方法·····	(94)
关于新编中学《中国历史》教材现代史部分的几点 说明 ·····	(102)
要充分使用历史教科书 ·····	(114)
怎样钻研历史教材 ·····	(122)
关于我国奴隶社会土地所有制(井田制)的几个教学 问题 ·····	(132)
怎样理解秦始皇实施的“以吏为师” ·····	(144)
讲授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经济方面教材的几个问题··	(149)
讲授中国古代史中有关政治方面教材的几个问题··	(162)

关于“王权神授说”	(175)
——我国古代政治史中的一个问题	
对讲授有关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教材的几个问题的探 讨	(179)
对中国史教学中处理民族问题的几点意见	(190)
怎样讲历史人物	(203)
如何通过人物的描述加强历史教学的形象性	(209)
论历史简表	(216)
历史和文艺	(222)
诗歌与历史教学	(225)
历史教育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29)
就历史教学过程的客观规律问题答客难	(237)
试谈发展学生智力和培养学生能力的问题	(245)
如何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257)
略谈历史课中的启发式教授法	(268)
如何纠正学生掌握的历史概念中的常见错误	(277)
如何培养学生学历史的兴趣	(287)
记忆历史知识的方法	(293)
怎样写历史教案	(301)
取材要精当	(307)
教学随笔两则	(311)
历史课在高考复习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316)
怎样总结教学经验	(325)

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

一、历史研究的对象

先说一说，“历史”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在古代，“历史”两字尚未连用，只称“史”；记载史的人称史官，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记言，就是记录统治者说的话；记事，就是记录统治者办的事。在今天看来，这些自然都属于“史”的范围。但是，当时的史官，不单单是记言记事，凡天文地理，人事灾异，统统由他们记录。《说文》说：“史，记事者也。”凡是文字记录的东西，都可以称史。史的范围，古人理解得比我们今天要宽。

相传黄帝时就有史官，其说不可信。商代有史官已确凿无疑，甲骨文中贞人的名字，都是史官。到西周，史官职务分工明确。据《周官·礼记》载，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之分。史由史官假借而得名，并非来自史书。所以最早的史册，反而不称史，而称志、书、策、记、春秋之类。如《周书》、《春秋》、《战国策》等，都不是以史名书的。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中，从唐朝人李延寿作《南史》《北史》起，就开始以史名书了。宋人欧阳修作《新五代史》，本名《五代史记》，犹存古义。

“史学”的名词，始于十六国。晋太兴二年(公元319年)，石勒自立为赵王，以任播、崔谡为史学祭酒。祭酒，即一学

之长。到刘宋元嘉中，宋文帝设立玄、儒、文、史四学，“史学”由当时著名学者何承天主司其事。史学的分科研究和分科教学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史学”的原义，是指研究史的专门学府，非指历史这门学科。唐朝人刘知几的《史通》中，还是习惯称史，未称史学。史学作为学科的称呼，是唐以后逐渐流传开来的。

“历史”这一名词，出现于近代。清末，废科举，兴学校。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颁布的《钦定小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中，学科设置有“史学”一门，到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九年颁布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等学堂章程》和《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中，把史学这门学科的名称，改为“历史”。同年出版的两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也冠以“历史”的称谓：一本是丁宝书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另一本是自称为横阳翼天氏的《中国历史》。从此以后，“历史”的名词就沿用下来了。与史学科目同时改名的，还有“舆地”改成了“地理”。至于为什么叫“历史”，大概来自日文，日本人早称史为历史。当时搞教育改革，拟定章程，受日本的影响较深。中日两国文字相通，就搬过来了。

“历史”两字的来历，也还有一些别的说法。顾颉刚著《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六章中谈到：“司马迁曾经发过一句牢骚话，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即此可知当时史官必须懂得星历。大约现在‘历史’这个名词就从这上面来的。”卢绍稷著《史学要论》第一章第三节中认为，历史两字来自章学诚《文史通义》一书中。章学诚说：“夫历史合传独传之文具在，曷赏必首标其色目哉！”这两种推测，未免

牵强。一个新名词的出现，附会于古人的说法，是大可不必的。

由上可知，“历史”两字连用，首先出现在学校课程和中学教科书上。广大教师，特别是历史教师知道这一点，是有必要的。

弄清了“历史”这个名词的来历，我们再说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研究的对象极为广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广义而言，历史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全部现象。狭义而言，历史指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客观规律。平常我们所说的历史，指的是人类史，即狭义的历史科学。

即使是狭义的历史科学，研究范围也极为宽广。从纵的方面说，有了人就有了人类的历史。历史的生命，与人类社会同样长久。从横的方面说，包括人类社会的全部现象，分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思想文化等诸方面。历史科学与法学、政治经济学等不同，后者是研究人类社会生活中某特定的现象及其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前者则是对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综合的研究。历史科学涉及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要勾勒出人类生活的全貌，因此它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门基础科学。同时，历史科学的发展中，也要吸取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古生物学以至地质学、天文学等科学部门的研究成果。

由于历史科学这种综合性的特点，要求史学工作者应当具有最广阔的眼界，多方面的知识修养。古人也是这样要求的。《南齐书·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物之理”，“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但是，古人有时把历史研究的对象说得广漠无垠，如“五经皆史”、“六经皆史”，以及“史之外，无有文字焉”之类的见解，就超越了历史学的范围。有人提出历史主要应研究生产和经济。在过去我们忽视了这方面的研究，现在强调一下很有必要，但不应该走向绝对化，模糊了历史研究的中心问题。历史研究中，要处理好两方面的关系，一个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要取得自身的发展，必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从事生产、发展经济，是改造自然的一种手段。这个方面主要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范畴，只有其中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的历史，社会经济形态变化的历史，才属于历史学研究的范畴。作为人类史，主要应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无论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思想文化，都无一不是一种阶级关系。以经济来说，一切经济范畴都是一时代生产关系的产物，在阶级社会里，经济范畴是这一时代阶级关系的产物；如果离开这种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便不能理解经济范畴，不能把握经济范畴的本质。历史学主要是研究人们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思想文化等基本事实中所表现出来的阶级、阶级间的矛盾和运动。现行中学历史教材就是根据这样的观点编写的。

科学的发展愈来愈深，分科也愈来愈细。我们要推进历史科学的深入发展，必须仔细地弄清楚它的研究对象。

二、历史研究之为科学

我国古代，历史学最为发达，著作之多，占世界各国的首位。按章学诚的说法，古代史籍分撰述、记注两类。撰述为专门的著作，记注为史料的搜罗。但是，不管撰述和记注，在今天看来，都只能算史料的汇集，远未形成科学的体系。历史研究要成为一门科学，关键在于是否能从迷乱混沌的状态中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古代史学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几句话，被古代史学家奉为格言。但是，不管是司马迁还是别的史学家，当他们提起笔来，说明人和自然(天)的关系时，往往陷入上天决定人间事变的天命论；说明古今变化时，往往陷入个别人物的愿望决定历史发展的英雄史观。他们看到了历史的变化，也想从中找到变化的法则。历史循环论，就是他们找到的一个。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司马迁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恰好中国历史形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现象，遂牵强附会，认为中国历史是终而复始地打圈子，不断地回到它的出发点。其实历史是变动不居，日进无已，它的发展表面上看是一个圈子又一个圈子，其实后一圈子与前一圈子并不在一条线上，而是呈螺旋形向前发展。历史现象之间会有很多相近之处，甚至貌似，但它却有着根本的区别，甚至本质的区别。纵看中国历史，前代治乱与后代治乱，何尝完全一致？历史循环论比起相信唐虞是盛世，后来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退化论来，自然要进步些。但是历史循环论不

能给历史以科学的说明，因为它违背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到近代，资产阶级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康有为提出了“公羊三世说”，认为历史的发展“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由君主而君民共主而民主，由专制而立宪而共和”），并运用这种历史观来指导他发动的维新运动。虽然康有为的历史进化论仍然装在“孔子圣道”的“微言大义”中，但比封建旧史家的历史退化论和历史循环论都要进步。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史界革命”，向封建主义的“旧史学”挑战。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之进化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饮冰室文集》之九《新史学》）“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降替，虽名为国史，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中国史叙论》）在这里，梁启超明确地提出了历史要研究人群进化的“公理公例”和历史事件的因果法则。他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还为人们作出了示范。他虽然在个别问题上找到了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但是从全局来说，没有揭示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说明，历史进化论仍然不能敲开历史科学的大门。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

——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0页）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历史学中一次深刻的革命。在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把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当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的历史，劳动人民的历史，阶级斗争（原始社会除外）的历史加以研究；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揭示了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历史学第一次成为真正的科学。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学术界激起的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得到了发展。李大钊是最早把唯物史观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一个人。他提出了全部历史必须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改作”、“重作”的主张。他著的《史学要论》在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沫若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史的开拓者，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稍后出版的《青铜时代》，在中国史学界无疑是“划时期的作品”。他创造性的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肯定中国也有奴隶制度的存在（西周），并且认为春秋到鸦片战争前是封建制。吕振羽于1934年到1937年，先后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他认为：夏和夏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殷代是奴隶社会，周代是初期封建社会，秦到鸦片战争是“变种的”（即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继郭沫若和吕振羽之后，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贯穿了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等唯物史观的原则，特别重要的是用具体事实证明了中国社会历史是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向前发展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不仅写了许多新著，而且纠正了旧作中的个别论点，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郭沫若的《文史论集》、翦伯赞的《历史问题论丛》和《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在宣传唯物史观，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同人们认识任何事物一样，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0页）直至今日，也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弄清楚，还要继续不断地进行新的探索。历史循环论、历史进化论和历史唯物论，都承认历史是变化的、发展的，都想从中探讨历史变化和发展的因果关系，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才真正揭示和发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人们的认识过程来说，我们不能把历史循环论和历史进化论仅仅看成是异端邪说，而是呈螺旋形的认识过程中的两个环，是两朵“不结果实的花”（列宁语）。当然，把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过程，仅仅归纳为以上所说的这样三个环，不过是一幅粗劣的漫画，要是用工笔素描，还得花更大的力气。

研究历史，对于资产阶级学者甚至封建学者的著作不可全盘否定。批判地接受他们研究的成果，采取其合理部分，是十分必要的。就史学评论的著作来说，资产阶级学者在

三、四十年代，写了不少著作，比较著名的有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等。封建学者中，最主要的有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些著作中所说的鉴定资料、整理史实、编纂史书等方法，牵涉很广，有许多可以继承的东西。何炳松在《历史研究法·序》中，对吸收古代史论遗产上，开列了一大堆人名和书名，今抄录如下：

“表示疑古态度，足为史家之楷模者，莫过于王充之《论衡》，及崔述之《考信录提要》。辨别古书真伪，足明论世知人之道者，莫过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姚际恒之《古今伪书考》。考订古书文字，示人以读书明义之法者，莫过于王念孙之《读书杂志》，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及钱大昕之《二十二史考异》。断定史事，审慎周详，示人以笔削谨严之道者，莫过于司马光之《资治通鉴考异》，李焘之《续通鉴长编》，及李心传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讨论文史异同并批评吾国史法者，莫过于刘知几之《史通》，章学诚之《章氏遗书》，及顾炎武之《救文格论》。综合史事示人以比事属辞之法者，莫过于顾炎武之《日知录》，及赵翼之《陔余丛考》与《二十二史劄记》。此外如《二十二史》之《考证》，诸史籍中之序文及凡例，以及历代名家之文集，东鳞西爪，尤为不胜枚举。”

这里虽然提到很多书，但由于作者没有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部分，而是糟粕和精华一锅煮，所以他写的《历史研究法》，仍然陷进了封建史家的臼巢。何炳松这本书是1930年出版的。当时不仅马克思主义早已传入中国，而且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已经在研究中国历史上做

出了很多贡献。由于作者拒绝用马克思主义支配自己的研究工作，虽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在史论建设上并未做出应有的成绩。范文澜早年研究历史，也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五四运动时，他还在专门研究汉学，学习旧的东西。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早先学了的那些旧知识、旧史料，运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写出了资料丰富、文字纯熟、观点明确的史学巨著，并且在宣传历史唯物论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这里一正一反两个例子说明，对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在接受前人遗产时，才能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化腐朽为神奇。

恩格斯说：“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2页）研究历史科学也是这样，不管研究者是否自觉，不是受历史唯物论的支配，就是受历史唯心论的支配，中外古今，概莫能外。历史专业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并用它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就能少走很多弯路。当然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要复杂得多，社会现象本身的运动发展规律只能以人类经历的阶段为认识的限度。历史唯物论是历史研究工作者的理论武器，历史研究的新成果又要丰富历史唯物论的学说，从而使它保持强大生命力。无论是历史唯物论或是历史科学，都要在新的研究中获得发展，不会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